

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資產——對台灣外交處境的啓示

張國城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資產。筆者的問題意識在於：除了美國的軍經援助之外，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是否存在某些資產，得以在非常獨特的環境中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並且爭取利益。基本上，本文從以色列的外交狀況開始，分析以色列在對外關係上的特殊狀況，進而討論這些狀況如何影響外交政策，以色列又如何因勢利導創造出外交政策的資產。筆者也從國際關係理論出發，探討這些以色列的外交資產對於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國家對外行爲的理論是否有甚麼補充的作用。經過初步的分析，筆者認為以色列存在許多資產，包括成爲美國的重要盟友，民主體制、猶太國家、願意談判，還有創造各國樂於與之交往的價值。而以色列創造和活用這些資產的過程和經驗，足以對國際關係理論形成一定的補充作用，也值得台灣作爲參考。

關鍵詞：以色列、外交政策、國際關係、中東政治、外交政策資產

壹、前言

由於中東問題，以色列向來是國際新聞的焦點。從 1948 年復國以後，以色列在艱困的環境中逐漸壯大，一般都認為是美國的支持所導致。但較少人注意到，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也在維護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和爭取以色列的國家利益上，發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雖然以色列不時遭到外交排擠、仍有國家不承認以色列，但總的來說，以色列仍然是國際社會活躍的成員，和主要國家維持良好關係，對外經貿持續成長，和以前的最大敵人簽訂和約，以色列的外交在這中間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色列究竟創造或利用了什麼資產，得以在這麼獨特的環境中支持外交並且爭取利益？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基本上，本文將從以色列的外交狀況開始，分析以色列在國內及對外關係上的特質，進而討論這些特質如何影響外交政策，因而形成以色列外交政策的資產。最後，筆者將試圖歸納出這些資產對於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國家行為的理論有沒有甚麼補充的作用，最後在結語中試著指出台灣或許可以參考的部分。

貳、以色列的外交關係發展階段與其特色

以色列在 1948 復國後，一年後（1949 年 5 月 11 日）加入了聯合國。到現在，以色列與 159 個國家保持正式的外交關係，不過，仍然有幾個國家拒絕承認以色列，主要是阿拉伯國家（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1）。以色列的外交關係發展階段大概可分為五個階段，主要表現在與美蘇、和鄰近國家關係的變化上（Gorvin, 1998；Mansour, 1994）：

一、建國初期

1948 年 5 月 14 日，猶太人國家誕生，國名為以色列。立刻得到美國承認。同年 5 月 18 日，蘇聯政府就宣佈承認以色列政府，成為繼美國和瓜地馬拉後，第三個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以色列之所以能成為國家，關鍵在於同時獲得了美蘇兩個大國的支持。而蘇聯的支持在軍事上更有意義，因為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國戰爭的頭六個星期，連美國都宣佈對中東禁止出售或運輸武器，以色列主要從捷克轉口的蘇聯大炮、機槍、和飛機，打贏了這場戰爭。

在這一階段，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主要是西歐國家、和美洲國家，但實質支持來自於蘇聯。當時蘇聯之所以採取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一方面是為排擠英國在中東的利益；另一方面從蘇聯當時在中東可選擇的外交空間來看，它與阿拉伯國家還沒有建立緊密合作關係。蘇聯為實現其南進戰略，急需在中東地區尋找一個支點，當在阿拉伯世界中沒有找到「登陸點」時，就選擇了以色列，試圖將以色列培植為打入中東地區的「棋子」，希望它成為其實現南進戰略的支撐點，所以大力給予支持（Gorvin, 1998: 221-40）。以色列也希望蘇聯放寬境內猶太人移民以

以色列的限制，因此也非常重視以蘇關係。

在這一階段，美國政府除了承認以色列外，還沒有進一步增加兩國戰略聯繫的外交努力；這一關係框架為其後歷屆政府所遵從，以色列也因此沒有積極加入美國主導圍堵蘇聯的巴格達公約組織（Mansor, 1994: 2-20）。

二、1948-67

1952年7月，埃及以納瑟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推翻了親西方的法魯克王朝。納瑟政府堅持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立場，奉行中立和不結盟政策，引起西方國家的不滿，它們企圖以拒絕提供武器為手段，削弱埃及的軍事力量，迫使納瑟改變其內外政策。納瑟轉而向蘇聯求助。赫魯雪夫迅速抓住這一機會，以令人矚目的優惠條件向埃及出售了大批軍火。此後，蘇聯通過向中東國家提供軍火，逐漸與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葉門建立緊密聯繫，各國逐漸採取親蘇立場。

在這一階段，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與蘇聯的親近深感擔憂，屢屢對蘇聯向阿拉伯國家提供武器提出抗議，並加強了與美國的聯繫，放棄了過去的平衡政策，但是美國對於以色列的支持仍然相當保守，因此以色列主要向英國和法國購買武器。1956年7月，埃及政府宣佈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西方國家決定對埃及動武，以色列充當馬前卒，派兵進攻埃及。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蘇聯一方面堅決支持阿拉伯國家，另一方面對以色列進行強烈譴責，召回了駐特拉維夫的蘇聯大使，蘇以關係又趨緊張。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發動了對阿拉伯國家的六日戰爭。戰爭爆發後的第五天，蘇聯宣佈斷絕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此後，雙方的公開來往幾乎完全中斷。連帶所有共產國家和大批非洲國家，都和以色列斷絕或、降低關係。

但另一方面，美以關係卻逐漸深化。1956年蘇伊士危機爆發後，美國雖然為顧全其在中東的整體戰略利益，採取有效措施迫使以色列停戰並撤軍。但由於戰爭改變了中東的國際形勢，美國不得不重新評估其中東戰略，在此基礎上美國對以色列的戰略地位和對以政策重新檢討，為兩國關係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奠定了基礎。美以關係發生實質性的轉變，是在甘迺迪政府時期實現的；美國認為以色列的干預能力、防衛能力、軍事研發及情報能力，以及接近中東產油國家與蘇伊士運河的地理位置，都是美國的重要戰略資產（Mansor, 1994: 2-20）。

三、1967-73

1967年戰爭之後，以色列和西方國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國家關係幾乎降到最低點。由於1967年戰爭中以色列佔領了大批領土，導致聯合國通過242號決議案要求以色列必須退回到1967年戰爭前的邊界，以色列拒絕此一決議，讓以色列被全體伊斯蘭世界和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所孤立。也就是說，以色列所獲領土和其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成了其外交政策上的負債。這時蘇聯全力支持阿拉伯國家，大量軍援埃及和敘利亞，讓以阿軍事對抗局勢升到最高點。

但另一方面，1967 年之後美將以視爲戰略資產，除了援以之外，也開始將以視爲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工具。1970 年約旦與巴解組織關係惡化，美國透過以色列的軍事力量，協助當地親美政權免受衝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1a）。此後，美國與以色列的合作在十月戰爭中的表現更爲明顯，以色列將戰爭中收集到的蘇聯軍事情報和虜獲的大批蘇製軍事裝備送交美國，美國則大量軍援以色列，美國的行爲激起了阿拉伯國家的普遍憤慨，造成 1973 年石油危機，爲此美國必須要對其以色列的政策進行微調，以減少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這中間，以色列對於美國而言，既是戰略資產也是負債。而以色列也因爲美國的壓力，而必須在一些政策上改變，甚至作出某些讓步，因此，美以關係對以來說雖是資產也有負債成分。

然而，蘇聯對以色列態度，在 1970 年代以後又產生變化。1970 年 9 月，埃及總統納瑟去世，沙達特掌握了政權。沙達特改變了納瑟的某些政策，加強了同西方國家的經濟往來，引起蘇聯的不滿。更爲重要的是，由於以色列屹立不倒，沙達特爲了加強對抗以色列的阿拉伯力量，企圖建立一個阿拉伯聯邦，就與蘇聯的中東戰略發生矛盾。因爲蘇聯不希望中東地區出現任何一個區域強國，所以蘇聯與埃及的關係逐漸惡化，蘇聯放慢了對埃及的各種援助。1973 年 10 月，埃及和敘利亞不顧蘇聯和美國的反對，發起十月戰爭。蘇聯出於對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沒有全力支持埃及，同時蘇聯武器表現不佳，讓兩國慘遭敗績，令埃蘇關係惡化。戰爭結束後，埃及宣佈廢除『蘇埃友好條約』，蘇聯完全退出了埃及。由於蘇聯在十月戰爭中的表現令一些阿拉伯國家不滿，蘇聯在中東的外交空間縮小，於是又重新考慮同以色列的關係。因此以蘇關係回到冷和局面。

四、1973-90

在 1973 年戰爭之後，以色列繼續作爲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資產，加上 1977 年與埃及簽訂和約，以色列這種配合美國中東政策的形象、以及作爲使美國完全壓倒蘇聯成爲中東唯一的主導力量，成爲以色列新一項外交資產，爭取到了更多美國援助。歸還西奈半島給埃及，也讓以色列在外交政策上的負債有所減輕。

1985 年 3 月，戈巴契夫上台執政，蘇聯政治歷史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戈巴契夫力倡「新思維」，他認爲與以色列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是不正常的，因而加強了同以色列的聯繫，放寬了猶太人移民政策。1987 年 10 月，一個蘇聯領事代表團訪問了以色列，同年以色列外交代表團回訪蘇聯，雙方恢復了領事關係。1988 年 10 月，蘇聯外長和以色列總理在聯合國舉行了會談。1989 年 1 月和 2 月，兩國外長分別在巴黎和開羅會晤，討論兩國復交和有關中東和平問題。此後，兩國間交往往益頻繁、蘇聯完全放開了蘇聯猶太人的移民限制，1987 年約有 8000 人移居以色列，1988 年提高了一倍，爾後劇增到每個月 1 萬人，1990 年 12 月一個月，竟有 3.5 萬名蘇聯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從 1990 年到 1992 年，移居到以色列的蘇聯(後爲俄國)猶太人高達 40 萬人。1990 年海灣危機爆發後，兩國關係進入全面發展的階段。1991 年馬德里和會召開前夕，兩國正式恢復邦交（劭麗英，

1999)。蘇聯改善對以關係影響了東歐國家的腳步，各國陸續和以關係正常化，也緩和了一部分接受蘇聯軍事援助的國家對以的敵對態度⁴。

五、1990-

1990 年海灣戰爭爆發，中東地緣政治產生了重大變化，從過去的「阿拉伯國家聯合對抗以色列」轉為「美國聯合海灣周圍的阿拉伯國家共抗伊朗伊拉克」的格局，以色列不再是眾矢之的，因此以色列外交關係全面改善。在這一階段，以巴關係出現重大變化，以色列開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進行談判，在 1993-95 年，以巴先後簽署『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即『奧斯陸協議』）、『加沙和傑里科先行自治協議』、和『擴大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自治範圍的協議』。1997 年 1 月，以巴簽署了有關以軍在希伯倫重新部署的協議，規定以從希伯倫 80% 的地區撤出。1998 年 10 月，以巴簽署了以色列第二階段從約旦河西岸撤軍協議，即『懷伊協議』。1999 年 11 月 8 日，巴以正式啟動最終地位談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1a）。雖然以巴之間仍有很多的歧見，但和 1960、及 1970 年代的狀況相比，已有天壤之別，更讓這一長期存在以色列外交上的「負債」減低。

以巴關係改善，大幅改善了以色列和中東國家的關係。1994 年 7 月 25 日，以色列和約旦在華盛頓簽署和平條約，宣告結束兩國長達 46 年之久的戰爭狀態。同年 11 月，以、約建交並互派大使，兩國關係完全正常化。2002 年 2 月，敘利亞總統巴沙爾表示敘願就戈蘭高地問題與以達成和平協議。2003 年 5 月，以總理辦公室證實：伊拉克戰爭前，以色列與敘在約旦進行了接觸，但以方拒絕敘方立即重開談判的建議。2008 年 5 月，以敘雙方在土耳其斡旋下展開非直接談判。1994 年，摩洛哥與以互設利益辦事處；海灣六國解除對以間接經濟制裁；多數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一起參加了第一屆中東北非經濟首腦會議；以總理拉賓首次應邀訪問阿曼。1995 年 10 月，除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外，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參加了在安曼召開的第二屆中東北非經濟首腦會議，以阿雙方簽訂了許多實質性協議和合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1b）。

就和外國的關係來看，以色列對外關係最大的特色，首先是和所處區域內的鄰國關係反而較為疏遠、甚至敵對。自從 1948 年獨立建國以來，以色列在外交上便遭遇到一些困難，主要是遭到中東各鄰國的集體抵制，而一般國家通常都和區域內的鄰近國家關係較為密切，並且試圖在區域國際組織內扮演重要角色⁹，以色列的狀況可說相當獨特。截至 2011 年，以色列僅和埃及、和約旦這兩個有陸地邊界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為了解決這種困境，以色列開始與遠離中東地區的世界國家發展外交關係。以色列政府也特別注重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以及一些新獨立不久的非洲和亞洲國家。

由於長年的戰爭和衝突，以色列如何經營與鄰國的關係，是影響世界各國對以色列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在 1967 年之前，除了阿拉伯國家和一些穆斯林國家。

⁴ 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蘇以改善關係後，印度也和以色列在 1992 年正式建立邦交。

⁹ 如阿根廷在美洲國家組織，馬來西亞在東南亞國協（ASEAN），或法國在歐盟（EU）。

以色列與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保持外交關係，之後，由於長年的以巴衝突，許多國家和以色列終止了外交關係，或者是僅保持有限的外交往來。但在 1991 年馬德里會議和奧斯陸會議之後，由於以巴和平協議的簽訂，以色列和 68 個國家建立或恢復了正式的外交關係；這種獨特的外交處境，在其他國家不太容易發現。譬如日本和韓國的領土糾紛，就對他國的對日或對韓政策幾乎毫無影響。根據藍格拉 (Rangarajan, 1995: 8) 的研究，衝突將因參與者的增多而形成擴張的情況，這麼多國家將他們的對以政策，寄託於以色列如何處理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從某個角度來看，是複雜化了以巴之間的衝突。

此外，以色列的對外關係，還受到種族的影響。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猶太人國家，他國對猶太人的態度，直接影響對以色列的態度與關係。某些國家，如伊朗，和以色列並無領土糾紛，和以色列也沒有交戰的紀錄，但由於其反猶的態度，使得伊朗成爲以色列主要的國家安全威脅。美洲國家由於有大量的猶太人居住，因此和以色列的關係也較佳。1947 年聯合國表決在巴勒斯坦地區的阿猶分治案中，33 個贊成國家中美洲國家占了 15 個。1948 年以色列建國後一年，除了美國、和加拿大以外，有 20 個拉丁美洲國家承認它，占承認以色列國家總數的 40% (徐向群、余崇健，1995：467)。

參、以色列外交政策可利用資產

在獨特的對外關係環境之下，以色列藉由各項努力，形成了多項足以支援外交政策的重要資產，對其改善對外關係具有顯著的貢獻。

一、成爲美國的重要盟友

如前面所述，以色列建國以後的外交政策重點就是爭取大國尤其是美國的支持。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美以關係已經成爲以色列的重要外交資產。以色列和美國關係非常密切是人盡皆知的，以色列藉由成爲美國的重要盟友，從美國得到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美國在聯合國以及其他的國際組織更是具體的利用其本身政經影響力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非常善於將以色列對美國的需求，和美國的戰略利益聯繫起來。在 1970 年代以前，以色列成功地讓美國相信，以色列的生存是美國重要的戰略利益。因此，在 1973 年十月戰爭中，美國空運了大批武器緊急支援以色列，甚至將美軍現役裝備直接塗去國徽後交給以色列。在以色列國家生存不再是問題之後，以色列又成功地讓美國相信，中東地區出現任何對以色列不利的霸權也都對美國不利，因此，以色列必須對中東任何國家保持軍事上的優勢。譬如 2011 年 3 月 7 日，以色列國防部長埃胡德·巴拉克表示，鑒於阿拉伯國家的抗議活動可能威脅到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因此，以色列可能要求美國再追加 200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他指出 (崔海培，2011)：

在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等地進行的抗議活動是歷史性的事件，處於正確的方向，……這表明阿拉伯國家正在走進新時代，但是伊朗和敘利

亞將可能是地區內最後發生民眾示威的國家。……我認為美國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對雙方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所以繼續追加 200 億美元不僅將為下一代以色列人提供安全保障，並且一個強大、負責任的以色列有助於地區的穩定。

目前，以色列每年的軍費開支大約為 170 億美元，約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 9%，其中美國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軍事援助達到 30 億美元。巴拉克稱，雖然以色列並沒有受到直接的安全威脅，但是從長遠來看必須增加軍費開支，「……你可以看到，現在阿拉伯國家的領袖們已經開始在下注，打賭伊朗和美國誰才是地區的最強者」（崔海培，2011）。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直接援助以色列之外，美國一直在獎勵和以色列改善關係的以色列鄰國。在人類外交史上，以如此的方式支援盟國，恐怕是絕無僅有的。1979 年以色列同埃及簽署和平條約後，美國開始大規模向雙方提供無償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軍事援助為 18 億美元，向埃及提供的數額為 13 億美元。除此之外，還持續向兩國提供約為軍事援助數額一半的經濟援助。據粗略估算，1979 至 2002 年間，僅為了保障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美國就付出了約 750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代價，加上向雙方提供的經濟援助、和一次性特別援助，以色列和埃及在過去的 23 年裡，已從美國得到了 1100 億美元的贈款，其中以色列得到的份額約占 60%，埃及約占 40%。

1994 年約旦同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不僅開始向約旦提供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還免除了約旦兩億多美元的債務。此後，美國每年對約旦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總額均超過了兩億美元。據美國參議院 2001 年 12 月 30 日通過的總額為 154 億美元的 2002 年度對外援助法案，在全部 22.395 億美元的對外經濟援助額度中，以色列將得到 7.2 億美元，埃及將得到 6.55 億美元，約旦將得到 1.5 億美元（殷罡，2001）。

2011 年據約旦計劃與國際合作部公佈的數據，美國 2010 財政年度對約旦的援助總共 6.6 億美元，其中 3.6 億為經濟援助，另外 3 億美元為軍事援助。約旦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主要援助受益國之一，自 1952 年以來，累計接受美國援助超過 70 億美元（中評社，2011）。也就是說，以色列和同以色列實現了關係正常化的周邊阿拉伯國家所得到的美國經濟援助，占美國對外經濟援助總額的 68%。根據同一法案，美國 2002 年度的對外軍事援助總額為 36.74 億美元，這筆款項的 93% 給了上述三國，其中以色列分到了 20.4 億美元，埃及為 13 億美元，約旦為 7500 萬美元（中評社，2011）。

美國對以色列還有與以色列實現了關係正常化的周邊阿拉伯國家穩定地提供大量經濟軍事援助，對確保在美國主導下，逐漸實現以阿衝突所有當事國之間的和平共處至關重要。因為美國透過軍事援助可以讓美國掌握各國軍方動態，建立與各國軍方的交往，也讓各國軍方不再受蘇聯/俄羅斯等其他強權的影響。進而建立美國所滿意的均勢。同時，它也是對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方面的一個很大的誘惑。

現實主義 (realism) 認為國際間是無政府狀態 (anarchy)，追求國家生存是國家最重要的目標 (Grieco, 1988: 492; Mearsheimer, 1994: 6)。這可以解釋以色列的政策，而美國的援助也不能完全脫離其戰略目標和利益而孤立的去看。冷戰時期，以外交和軍事手段遏制蘇聯，實現中東地區和平，保證該地區穩定的石油供應，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為主要的戰略目標 (Waltz, 1998)。在 1950 年代，美國雖然給予以色列這一新生國家巨大的外交幫助，但在軍事上卻並未將其看作重點對象加以考慮。

但是隨著冷戰形勢的發展，中東地區戰略環境的變化，進入 1960 年代後美國將實現這一目標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以色列身上，它對以色列實施軍事援助一方面是要保證這一戰略支柱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滿足以色列在安全方面的需要，換取它在以阿衝突方面對阿方的讓步，使阿拉伯國家中的溫和派抬頭，不至於完全走到西方的對立面。因此美國通過大量的援助，將以色列拉到自己的一邊。同時美國通過援助強化以色列，迫使阿拉伯國家在軍事上不斷面對挫折，並且逐漸承受不起繼續衝突的代價，基本實現了它利用以色列打擊激進的民族主義，削弱蘇聯在中東的影響的目的。從這一點意義上來說，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達到了它預期的目標。

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利益，以色列成爲美國重要盟友的原因除了強大的遊說團體、共同的價值觀、民主制度，還包括以色列對美國的積極貢獻。以色列人口不及紐約市，但是在美國有大量的投資，投資金額高達 514 億美元，以色列也是美國高科技產業最大的海外合作夥伴之一，在美國那斯達克 (NASDAQ) 上市的以色列企業僅次於美國，並且以色列能提供美國多種關鍵的軍事技術 (Waltz, 1998)。

但純就現實主義觀點，難以完全解釋美國爲何在 1970 年代初期開始願意得罪人口資源和土地面積都居優勢的阿拉伯國家而去支持以色列。在冷戰時期，這些國家能對付美國的武器比以色列多得太多，以色列若消滅對美國的整體冷戰情勢也未必會有根本性的動搖 (Nye, 2002: 210)。顯然，我們有尋求更可靠的理論工具的必要。

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認為，國家間的合作關係有可能讓成員國形成一種彼此互信的國際秩序，而這種秩序一旦形成，就會對雙方產生一種結構性的約束力量 (Wendt, 1995; Hopf, 1998)。從中東的戰略格局演變來講，在美以關係初期，美國也許只將以色列作爲實現自己戰略目標的工具，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美以雙方的戰略決策者都產生了一種慣性。在美國，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將與以色列的合作關係視爲美國中東政策甚至整體安全政策的骨幹之一，並且努力的推動它。而以色列也在中東事務上更多的服從與接受美國中東戰略的佈局，並積極調整自己的戰略以配合美國，美以雙方儘管並非事事觀點一致，但都對彼此不會損害自己的重要利益具有堅強的互信。如在 1991 年的海灣戰爭中，以色列在遭到伊拉克的飛毛腿飛彈打擊後，聽從美國的建議沒有對伊拉克實施報復。

2003 年美國在國際輿論的反對聲中對伊拉克進行打擊的時候，以色列則站在美國的一邊。當然，這些事例中雙方都有自己利益方面的考慮，但是，我們也不難看出，美國與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戰略格局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安全共同體，並已經適應了彼此在這一共同體中的身份定位，在這個安全共同體和「合作」、「互信」的身份定位下，雙方的戰略利益也因此而不斷深化與加強。而結構性的約束性力量則始終存在，因此以色列不會過度採取武力或是完全拒絕談判，讓美國無法面對來自國內的道德指責，美國也不會因軍火商的利益要求下對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海灣國家)的軍購要求照單全收。

隨著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長期戰爭，伊朗核危機又使中東地區戰略局勢複雜化，伊斯蘭激進主義勢力和恐怖主義勢力的威脅促使以色列和美國更具有了新的戰略利益與合作基點。在雙方合力建構的交往秩序已經完善，且彼此的利益身份已經確立的情況下，雙方的戰略趨同與合作將會進一步加強。因此，在我們觀察以色列與美國在中東地區事務態度，尤其是美國在以巴問題上明顯的偏袒以色列的態度的問題上，建構主義是具有一定解釋能力的。

二、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少有的民主國家

以色列從建國以來就採取議會民主制度，建國時的政治領袖並未成為之後的獨裁者，這是二戰後新興民主國家少見的。以色列的民主制度讓以色列容易得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其次讓以色列能免於阿拉伯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根據《聯合國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所指出的，中東地區發展停滯的根本原因被認為有三個：第一個原因是缺乏自由，絕對的獨裁統治、虛假選舉、司法依賴行政部門和公民社會受到種種約束，言論和結社受到嚴格限制；第二個原因是缺乏知識，6,500 萬成年人是文盲，大約 1000 萬人無學可上，科學研究與資訊技術發展落後；第三個原因是婦女參與政治與經濟生活在全世界處於最低水準，一半人口的潛力沒有得到開發（UNDP, 2009）。這些問題其實可以歸為一個，就是缺乏民主。但在以色列都不存在，使以色列能以社會的多元性、開放性，發揚國民的潛力，形成足夠用於外交的創意和巧實力。第三是以色列的民主足以作為和其他中東國家的對比，這也在冷戰時期美國選擇以色列作為中東地區遏制蘇聯的戰略支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冷戰結束後，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和經濟體制得到了更多認同、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變化讓他們和採取民主的以色列關係改善，這又使一些國家對以色列的態度有所轉變；民主的價值對以色列對外關係的正面價值顯而易見。

三、以色列的軍事科技足以協助其發展外交

以色列的軍事科技水準舉世聞名，多年來武器外銷金額為居世界前列，和歐美相比特別具備兩大特點：第一是以歷次中東戰爭實戰戰績為基礎，具有難能比擬的競爭優勢；第二是除了嶄新的裝備以外，以色列特別擅長舊式美蘇製武器的

翻新改良，這點可說獨步全球。由於以色列從建國以來情勢困厄，使用過五花八門的德、英、法和美製武器，又在戰場上繳獲大量俄製武器，對這些得來不易的裝備，以色列發揮猶太人節儉精神，從不浪費任何武器，對於它們的維修、翻新及改良功夫達到了極致，對仍大量持有這些武器又無力全面汰舊換新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大誘因，也是以色列發展外交的重要工具（Wileman, 1985）。

以色列雖然本身面臨外敵入侵的強大壓力，但不吝於給予他國軍事援助，特別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因為國內政治和人權狀況受到批評，難以從美國和西歐得到武器，以色列就在這中間填補了不少的空缺¹⁸；另一方面是扮演美國的秘密行動代理人角色，以色列曾經在美國的要求下代訓尼加拉瓜反桑定政府游擊隊，也曾援助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政府對付反政府游擊隊（Time, 1983）。這時，以色列在中東的反叛亂與綏靖作戰經驗就發揮了巨大作用，角色變換毫無困難。這都是以色列軍事力量在外交上的獨特作用，除了支援外交之外，軍事本身就是外交的一部分。

四、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獨特價值

以色列雖然經常在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態度和政策上引起非議，然而，猶太人英勇奮戰建立國家的犧牲精神、以及建設國家的努力，仍然是以色列外交政策中不可忽視的巧實力。以色列歷史和聖經、基督教文明的連結更是西方國家重視並同情以色列的重要基礎（Mansour, 1994: 277）。許多國家在建立國家之後的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上參考以色列的作為(如新加坡)，也給予以色列特殊的外交資產（Huxley, 2000: 197-98）。

對於多數西方國家和日本來說，阿拉伯裔在政治社群中影響力不大，因此，以色列不會是選舉的關鍵議題，知識分子和公眾也不會要求他們的領袖採取反猶立場。另外，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的歷史在歐洲仍記憶猶新，任何國家的領袖都不敢忽視這段歷史而對以色列的生存權有任何不敬之言。以法國總統薩科齊為例，雖然在以色列武力報復加沙走廊的哈馬斯民兵之後，薩科齊大力推動加沙停火，但其實法國只是希望從中凸顯大國角色，在過去五十年法國與以色列的關係還是相當密切的。

以色列的猶太人國家屬性也是以色列的外交資產，因為猶太人在各國都是少數族群，和以色列的關係可以做為某些國家表達其社會開放型態的象徵。例如土耳其的執政黨是一個中間偏右的伊斯蘭政黨，雖然對以色列有所批評，但執政黨人要透過與以色列保持良好關係，來和歐洲及北約證明他們並非是伊斯蘭主義者；土耳其軍方也要尋求強力的軍事盟友對付庫德族；因此，土耳其也像其他國家一樣，明白到與以關係是維持區內影響力的必要條件之一。

¹⁸ 例如阿根廷在 1970 年因軍事政權實施白色恐怖（史稱「骯髒戰爭」），遭到美國武器禁運，以色列這時適時向阿根廷提供大批二手的作戰飛機，如美製 A-4 攻擊機、法製幻象 III 式戰鬥機及以國自己拼造的「匕首」（Dagger）戰鬥機，成為阿根廷在福克蘭戰爭中的主要戰力。

五、以色列創造出各國樂意與其交往的價值

以色列雖然只是一個小國，人口比起一些國家的城市還少，但是在外交上相當活躍--美國、澳洲、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印度、日本、韓國、及歐盟和北約成員國，一向與以色列關係緊密；捷克、波蘭、和喬治亞等前蘇聯國家，也在打擊恐怖主義、保持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上理解以色列的立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亞洲、和南美的大部份國家，也逐漸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生存經驗，讓世界各國只要對於反恐和內部安全有興趣，都會想借助以色列的經驗或是和以色列有所合作。以色列是許多恐怖組織最重要的情報來源。政府也鼓勵科技業多元化發展，從資訊與通訊科技，轉而發展安全與監視科技。在這段期間裡，以色列國防軍（IDF）扮演類似企業育成中心的角色。年輕以色列士兵在服兵役時操作網路系統和監視設備，退伍回歸平民生活後，把自己的發現和想法變成事業計畫，設立很多新創企業，經營從資料蒐集、監視攝影機到恐怖分子側寫的業務（Senor & Singer, 2010: Ch. 2）。911 事件之後的幾年，這些服務與設備的市場出現爆炸性成長。娜歐米·凱琳說得很清楚（Klein, 2007: Ch.21）：

……以色列以國家的力量，公開主張新的國家經濟發想，那就是網路泡沫提供的成長要由國土安全繁榮取而代之。這是利庫德黨（Likud Party）鷹派立場和激烈芝加哥學派經濟制度的完美結合，具體表現在夏隆內閣的財政部長納坦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和以色列新中央銀行總裁費歇爾（Stanley Fischer）兩個人身上，費歇爾正是國際貨幣基金在俄羅斯和亞洲推動休克治療計畫的主持人。……2003 年，以色列已經開始從網路泡沫後強勁復甦，到 2004 年，以色列似乎創造了經濟奇蹟：在經濟慘烈崩盤後，表現幾乎勝過所有西方國家。成長一方面來自以色列政府的宣傳和鼓勵，把自己定位為國土安全科技的大賣場。這個時機拿捏十分完美；在反恐戰爭開始後，世界各國政府突然迫切需要獵捕恐怖分子的工具，也迫切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人物情報知識。在利庫德黨的領導下，以色列以國家的力量，自我宣傳以色列靠著幾十年對抗阿拉伯與穆斯林恐怖分子威脅的經驗與技能，是擁有領先優勢的國土安全展示國。以色列對北美和歐洲的宣傳直截了當：……你們剛剛開始的反恐戰爭，是我們從建國以來就開始打的戰爭，讓我們的高科技公司和民營間諜公司告訴你們怎麼做。

雖然有些友好國家會對以色列反擊哈馬斯（Hamas）的行動有怨言，但各國更重視與以色列的經貿關係、包括高科技與軍火貿易等議題，相比之下，他們對以巴之戰的聲音其實只是在展示她們的國際影響力和保持外交「平衡」。以色列也充分認知到這一點，並不堅持外國必須不批評以色列才能和以色列開展關係。因此以色列的實質外交並沒有受到近年來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很大的影響。

六、以色列願意談判

以色列雖然在國家安全的立場上保持強硬立場，但是並不排斥談判。和東亞

各國相比，以色列經常和周邊國家甚至是敵國就實質問題進行談判。

以色列已經在埃及、約旦、卡達、安曼、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等六國，設有外交使館。1967年，以色列奪取了約旦河西岸，但在2000年3月，以色列在談判後，於軍事優勢沒有變化的情形下，將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大約43%的領土歸還巴勒斯坦。1982年，以色列在與敘利亞大戰後占領了黎巴嫩南部，2000年5月24日，以色列部隊仍然在軍事優勢沒有變化的情形下，於談判後從黎巴嫩南部撤軍，結束佔領。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在當年6月揭櫫處理巴勒斯坦問題的重大方針，期望透過持續性協商與經貿合作交流，爭取以色列在軍事戰場上沒有得到的利益。

以色列習於進行談判讓以色列能夠得到許多利益，包括：

- 塑造以色列理性的形象，有利爭取國際支持；
- 願意談判的態度可以讓對方內部支持談判的勢力和領袖人物居於一個較為有利的位置；
- 談判可以給以方更多影響對方行動的籌碼；
- 談判讓以方有機會觀察對方的決策與行動模式；
- 讓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所得到的成果更進一步地化為國家的資產和籌碼。因為在談判過程中，以色列的軍事成就必然成為以色列做為談判的籌碼，各國提出談判條件時也必須承認以色列的軍事進展。若沒有談判，各國就無從正視現實而流於各說各話；
- 談判的態度可以使我方更容易引進國際力量影響對方行為。

當然，談判也會讓對方有辦法影響我方的策略。但是在談判的過程中以方是較大的一方，具有較多的資源和工具來觀察和影響對方。同時也具有更大的改變現狀能力。

七、以色列有強大的遊說能力

在以色列國成立初期，美國猶太人支持以色列的表現形式，主要是為以色列募集資金。但當時，以色列遊說活動大多在幕後悄悄進行，例如1948年前後對杜魯門總統的遊說，主要是來自他的猶太朋友和顧問。在1967年「六日戰爭」以後，這種狀況大為改觀，在這場戰爭中，以色列面對阿拉伯國家的嚴重軍事威脅和挑釁，但仍在劣勢之下於6天內取得了對阿拉伯國家的決定性勝利。這對美國猶太公眾的刺激超過了以往，給予了他們很大的自豪感，成功反擊了反猶主義。此後，以色列遊說集團的政治訴求更多地被公開表達。在那之後，美國對以色列的外援才超過了私人捐贈。之後以色列遊說集團就一直在華府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Tivan, 1987）。

雖然外界常常把以色列遊說集團當作一個整體來描述，但實際上，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單一的以色列遊說集團，而是對一群通過積極活動促進美國親以外交政策的組織和個人的鬆散聯盟的統稱。以色列遊說集團中較有影響力的組織有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等等，它們主要由猶

太人組成。

以色列遊說集團的影響力來源首先在於猶太人的投票率。雖然美國的 600 萬猶太人只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三，佔選民比例不高，但是他們的投票率卻高達 90%，在歷來投票率不高的美國大選中就容易起關鍵性作用。而且，89%的猶太選民聚集在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新澤西、紐約、賓夕法尼亞等大選的關鍵選區。當兩位候選人勢均力敵時，猶太人的選擇就會成爲打破平衡的關鍵性因素(猶太網，2011)。2008 年美國大選，猶太選民中 78%的人投票支持歐巴馬，占了壓倒性多數，而投給麥凱恩的僅爲 21%。猶太選民對奧巴馬在一些關鍵州獲勝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佛羅裡達、俄亥俄、印第安納、北卡羅來那和賓夕法尼亞。其次，猶太人能夠爲候選人提供較多的政治捐獻，總統候選人不得不出作親以色列的姿態，否則就要冒這部分選舉資金流向選舉對手的風險(猶太網，2011)。

肆、以色列外交資產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補充

一、結盟的重要性

結盟的重要性在於得到他國的支持，在國際關係的歷史上存在無數的結盟，但是對於小國來說，從以色列和美國交往的經驗可以歸納出成功的結盟必須有幾個原則：

- 必須了解盟友的主要戰略利益和結盟需求。以色列就充分注意到了這一點。
- 不能存有坐待盟友支持的心態與政策導向：以色列接受美國軍事和經濟援助，但是在歷次中東戰爭中並沒有美軍助戰的紀錄。以色列不要美軍助戰可以讓美國人民不須面對子弟傷亡的壓力。這種壓力會讓受援助的國家完全被美國中止戰事的壓力所掌控，越戰中的西貢政權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政府基於美軍傷亡和「讓美軍戰俘回家」的壓力，急於推動停戰談判，結果就是爲了讓北越同意在談判桌上簽字以讓美軍早日撤離，犧牲了南越的利益。同時坐待盟邦來援也容易使國家不去培養自我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
- 結盟應當不形成安全困境：這一點以色列在 1960 到 1970 年代和美國的結盟在中東可能造成了安全困境，一如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形成針鋒相對的軍備競賽是 1967 和 1973 年兩次中東戰爭的原因之一。

二、創造價值並占據國際秩序中的「上游位置」

以色列雖然國土面積小，但是能夠創造爲人所需要的價值，譬如反恐戰爭展開後，美國軍事上的需要包括特種作戰部隊，執行反叛亂及綏靖作戰的部隊及相關裝備，以及後勤設施，這些都是以色列的強項 (Johnson, 2002)。但更重要的事是以色列已經成功的將它自己整合進國際秩序中的「上游位置」。所謂「上游

位置」意指國家的政策和利益和當時的「國際秩序」是相同方向的。同時國家採取用以維護利益的行動（先不論是武力抑或非武力），都會對其他國家形成影響，正如在河流的上游排放任何物體都會對下游形成影響一樣。因此要維持河流的流暢，自然需要注重上游。

早在 1956 年，埃及總統納瑟封鎖蘇伊士運河時，以色列就成爲要打通運河的英法必須合作的戰略夥伴，因爲當時打擊第三世界國家在蘇聯支持下的民族主義浪潮，以及維護石油運送孔道通暢，正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大方向（Bowie, 1974）。時至今日，如前面所說的，以色列讓自己成爲國土安全科技的大賣場，又有靈活的情報能力，在反恐戰爭主導的國際秩序下，以色列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以及長年對穆斯林恐怖分子的強硬政策和鬥爭經驗，再度和國際秩序的大方向是相符的；而以色列屯墾政策、談判政策，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態度，都在中東安全議題上占據了「上游位置」，結合以色列的硬實力、巧實力，讓各國在關注中東政策時，都不能不和以色列交往並重視以色列的意見與利益。這也是對單純強調國家有形實力的傳統現實主義的一大重要補充，只要占對位置，四兩也能撥千斤甚至產生大於千斤的力量。

三、民主對國家發展國際關係的重要

現實主義以國家爲獨立行爲者，並不太考慮國家的內部政治體制。也就是說，不論民主還是極權，現實主義學者認爲國家對外關係的決策模式在理性下還是大致相同。但從以色列的例子看來，國家內部體制仍會對其發展國際關係提供額外的影響力（可能是正面或負面）。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少數的民主國家，民主體制讓以色列不需要集中國家資源維護統治者的統治安全。民主體制讓以色列的政策更能公諸討論，也讓以色列人更容易團結一致。在中東地區不民主國家紛紛爆發革命的態勢下，更顯示出民主體制雖然短期看來有政治紛擾缺乏效率之弊，長期看來，卻是國家長治久安並在國際交涉中站穩立場的根本。若政權缺乏民主正當性，在資訊無國界的今天，自然以內部「維穩」，對外爭取外國承認並支持獨裁政權存續統治爲最高要求，以防革命爆發甚至出現內戰；要在國際議題上有強勢地位自是奢望。

在今天，不民主的政治體制往往成爲他國與之發展關係的障礙，除非是某些擁有人口或資源優勢的大國。首先，不民主的體制容易引來道德上的攻擊，讓其他民主國家的政府因顧及民意反應而退縮。其次，不民主的體制對於外來援助經常有貪污浪費的情形，這也形成了阻止他國援助的誘因。以色列的民主體制讓其避免了這些問題。

四、敏銳反映地緣政治的變化

地緣政治強調，環境對國家政策及區域政治有相當的影響力。以色列則設法將周邊地緣政治的變化轉爲對其外交的助力，特別是與區域外國家發展關係的動力，這是非常有趣的。以色列建國後與日本、韓國和印度等東亞國家過去關係較

為淡薄，主要原因在於：

（一）東亞國家和以色列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存在著很大差異，例如印度有相當多的伊斯蘭人口；各國都沒有大的猶太社群，因此並不關切以色列的安全。

（二）東亞國家除了印尼外在經濟上都依賴於中東的石油，因此更重視與阿拉伯國家保持關係，不敢因和以色列發展關係而得罪所有阿拉伯國家，導致石油供應受影響；

（三）以色列和東亞、南亞相隔遙遠、交通不便也制約了雙方關係的發展。

然而，1990 年代初中東政治和經濟局勢轉變為以色列和亞洲國家關係發展開闢了新天地。誠如前面所說，1990 年海灣戰爭爆發，中東地緣政治產生了重大變化，以色列不再是眾所矚目；以色列適時轉變政策，啟動談判，於是有馬德里會議後中東和平進程的啟動以及奧斯陸協定的簽署，不僅令以改善了與中東國家的關係，更大大減少了東亞國家同以色列發展關係時的顧慮。以色列轉型為一個高科技強國的同時，亞洲國家的高科技產業也在蓬勃發展並將以色列視為合作夥伴。基於上述原因，以色列和印度、日本以及韓國的關係從 1990 年代起逐步升溫。

長期以來，以色列對東南亞國家知之甚少，在外交上給予的重視也是最少的。1950 年代初期，緬甸採取社會主義路線，對以色列的集體農場甚感興趣（徐向群、余崇健，1995：470-71）。因此和以色列保持密切聯繫，並在農業、建築、航運等領域開展合作，但由於以色列政府拒絕向緬甸提供武器，從而導致以色列與緬甸關係長期停滯不前。由於緬甸與阿拉伯國家保持著良好關係，因而在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後，面臨著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做出選擇的難題。以色列與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也有類似的經歷，但這些在海灣戰爭後都逐步改善。以色列的經驗證明，敏銳反應地緣政治的變化，適時調整政策，將會是小國外交政策資產的重要部分。

伍、結語與思索——以色列外交資產給台灣的啓示

對台灣而言，以色列和台灣雖然沒有外交關係，但是以色列和台灣的關係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以國駐台代表甘若飛曾表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不會限制兩國合作及交流互動，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台灣是科技產品的世界強國，以色列的研發及創新表現卓越，雙方存在互補的關係²²。台灣與以色列在基礎科學、農業、衛生醫藥、文化等有密切交流的合作關係，並簽訂多項協定及備忘錄。目前台以雙方也正在就簽訂海關業務、青少年交流、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完成多項協商。顯然，以色列看到了台灣外交上「走出去」的需要，也試探出在台灣與沙烏

²² 台灣許多半導體大廠，如旺宏及華邦已在以色列設廠；華邦電子更買下屬於美國國家半導體的研發中心。行政院開發基金也挹注資金到以色列創投公司，長榮航空公司客機改裝貨機的工作，也是由以色列航太工業（IAI）所執行。

地阿拉伯斷交之後，和以色列的關係已經不必再遮遮掩掩，因此除了傳統檯面下的情報合作和軍火貿易外，也增加了台面上的正式協商和協定簽署。

以色列的官方立場強調，台、以兩國關係是「多面向」發展，甚至在以色列最專長的「維安事務」上，以色列也願意提供協助，展望台、以未來的關係，甘若飛認為雙方顯然還有更大的空間；他說：「我們還要做更多」（陳恆光，2007）。明顯的以色列是以外交政策資產之一，創造樂與交往的價值，並且利用地緣政治的變化，來說服並誘使台灣和以色列發展關係。

筆者以為，以色列的獨特外交經驗和資產是台灣可以學習的。譬如在對美關係上，台美關係對以色列的重要性絕不亞於美以關係對以色列的重要性。從以色列的經驗看來，台灣要鞏固台美關係，不能株守現實主義中「強權國家必然對抗」的思維，必須局部引進建構主義的看法，讓美國人相信：

- 一、台美關係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支援台灣不僅有利台灣，更有利於美國；
- 二、台灣能為美國作出重大貢獻，台美間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
- 三、台灣能繼續為東亞的民主作出貢獻；
- 四、台灣能發展出獨特的價值，而不只是其他國家文化的一個分支。

目前看來，台灣似乎僅能枯守冷戰思維，說服美國在「中國崛起」的亞太大環境下，台灣是美國制衡中國霸權的重要棋子，而無法具體描繪台美關係是如何能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而且這種服務所產生的好處難以為其他的關係所取代。

以色列大量投資在自己最重要的盟邦，也是世界上科技最進步的國家。相對之下，台灣則是大量投資在自己的敵人，在世界科技發展也無甚建樹的國家，兩者的國家發展戰略差距實不可以道里計，台灣越來越無法對美國作出具體而難以取代的貢獻。

台灣民主體制在東亞民主化的浪潮下，已經逐漸不再突出，更談不上對東亞其他不民主的國家有何示範作用，反倒日漸像是中國的附庸。

誠然就結構上，以色列是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成員，國家身分已經無庸置疑，而台灣的國家身分仍然有很大爭議，也不是聯合國和重要國際組織的成員，因此大為限縮了台灣和其他國家交往的能力，而中國的打壓，更是以色列所不必面對的外交困局，但是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土人口都小的獨立國家，對面臨眾多難題的台灣，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是在強化對美關係、弘揚民主和軍事科技上，台灣仍然有一定可施展的空間；如何進一步參酌以色列經驗對此進行更多的努力，應當是台灣可走的方向。

參考文獻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1a。〈巴勒斯坦國家概況〉（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_4/1207/t312279.htm）（2011/07/02）。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1b。〈以色列國家概況〉（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_41/1207/t359219.htm）（2011/12/17）。
- 中評社，2011。〈約旦將獲 1 億美元援助〉1 月 3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6/8/5/10156854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56>）（2011/07/01）。
- 劭麗英，1999。〈俄國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變及發展趨勢〉（<http://www.jewc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76>）（2011/07/01）。
- 徐向群、余崇健（編），1995。《第三聖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遠東出版社。
- 殷罡，2001。〈美國對以色列政策:背景與基點〉（<http://www.israelcn.com/enter/peace/us-israel.htm>）（2011/06/24）。
- 崔海培，2011。〈以色列要求美國增加 200 億美元軍事援助〉3 月 9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4098786.html>）（2011/12/13）。
- 陳恆光，2007。〈以駐台代表：台以關係超越政治限制多面開展〉《中央日報》12 月 16 日（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08&docid=100241994）（2011/07/01）。
- 猶太網，2011。〈猶太人控制美國〉（<http://www.jewc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518>）（2011/07/01）。
- Bowie, Robert R. 1974. *Suez 19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1.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2011/12/13).
- Gorvin, Yosef. 1998. *Israel-Soviet Relations, 1953-1967: From Confrontation to Disruption*. London: Frank Cass.
- Grieco, Joseph M. 1988.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pp. 485-507.
- Hopf, Ted. 1998.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1, pp. 171-200.
- Huxley, Tim. 2000. *Defending the Lion City: The Armed Forces of Singapore*. St. Leonard, NSW: Allen & Unwin.
-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1. "Israel's Foreign Missions abroad: Status of Relations." (<http://www.mfa.gov.il/MFA/About+the+Ministry/Diplomatic+missions/Israel-s+Diplomatic+Missions+Abroad.htm>) (2011/12/21).
- Johnson, David E., Karl P. Mueller, and William H., V. 2002. *Conventional Coercion across the Spectrum of Operations: The Utility of U.S. Military Forces in the Emer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anta Monica: RAND.
- Klein, Naomi. 2007.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 Mansour, Camille. 1994. *Beyond Alliance: Israel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J. 1994.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3, pp. 5-49.
- Nye, Joseph S., Jr. 2002.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 to Theory and History*,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 Oren, Michael. 2011. "The Ultimate Ally." *Foreign Policy*, May/June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4/25/the_ultimate_ally) (2011/12/13).
- Rangarajan, L. N. 1995. *The Limitation of Conflict: A Theory of Bargaining and Negotiation*.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 Senor, Dan, and Saul Singer. 2010.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Hachette Book Group.
- Time*. 1983. "Israeli Arms for Sale."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23405,00.html>) (2011/12/13)
- Tivnan, Edward. 1987. *The Lobby: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9. *Arab Human Report 2009: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 (<http://hdr.undp.org/en/reports/regional/arabstates/ahdr2009e.pdf>) (2011/12/21).
- Waltz, Kenneth. 1998.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ndt, Alexander. 1995.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pp. 71-81

The Assets in Israeli Diplomatic Policy: Lessons for Taiwan

Kuo-cheng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brief overview of history of Israeli diplomatic relation. It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assets” that contribute for Israel’s diplomatic policies for decades. Some sections bring together from prior sections, posing and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assets” truly exist in Israel and help this small country to survive in a unique and hostile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primary analysis, we can exactly find some characters in Israel that can be defined as the “assets” for its foreign relations—the U.S. essential ally, democratic system, Jewish country, military technology, negotiation-favored manner and attractive for the other countries in homeland security fields. I conclude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assets and argue the experiments of Israel in creating and applying these assets for national interests can fulfill relative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provide some vital lessons for Taiwan.

Keywords: Israel, diplomatic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ddle East Politics, assets in diplomatic policy

